

# 从复古到性灵

——高棅的诗歌理论及其影响与流变

陈颖聪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复古到性灵——高棅的诗歌理论及其影响与流变/  
陈颖聪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218 - 08043 - 7


I. ①从… II. ①陈…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  
理论—诗歌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80679 号

Cong Fugu Dao Xingling GaoBing De Shige Lilun Jiqi Yingxiang Yu Liubian

从复古到性灵——高棅的诗歌理论及其影响与流变

陈颖聪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金炳亮

责任编辑: 黄洁华

责任技编: 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218 - 08043 - 7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 购: (020) 83781421

## 序一

“选本”在中国目录学传统中称为“总集”，指因应限定的范围或者特定的标准，收录相关的作品，总为一集。《四库全书总目》的“总集类”提要说：

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藪矣。

据此，“总集”有两个不同方向的意义：一是尽量搜罗，以免文籍散失；一是选择淘汰，只让其中有更高价值的部分保留下来。这两层的意义其实与客观历史条件有关。当数据匮乏，或者数据本来不缺，但因未受关注而流散四方时，搜罗的工夫比较重要；到关注意识渐次明朗，甚至同一范围的著作演成风潮时，则评比的需要就较大了。因此，“总集”或者“选本”都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历史的”——搜罗于特定时空之内的某种类型作品，“以存一代之迹”；另一是“评断的”——若相应作品量多，则只有“值得保留”的作品才会被甄选入集。《四库提要》所谓“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藪”，就是这个意思。

长久以来，这种汇集和选汰的活动对于文学的存有状态，几



乎有决定性的作用。晚明钟惺在与朋友谭元春合选的《诗归》序文中说：

选者之权力能使人归，又能使古诗之名与实俱狗之。

在《诗归》的夹注以及“题鲁文恪诗选后”篇中，钟惺又再申说：

选者之功，能使作者与读者精神为之一易。

删选之力，能使作者与读者之精神心目为之潜移而不知。

《诗归》是明代有大影响的诗歌选本，而在此以前，也有由《唐诗品汇》、《唐诗正声》、《古今诗删》、《唐诗选》，以至大量由这些重要选本衍生繁殖的各式各样选集版行面世；钟、谭二人面对这庞杂的文学时空，要为当前自己参与采选活动的意义作出省察反思，乃有这样的认知；而他们就《诗归》的宗旨立定：

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

如能达到这个目标，作为选家，其贡献就不止于为文学史建立“正典”，更可说是文学超越时空之关键枢纽。不过，所谓“古人精神”究竟何所指？怎样才能真正接引古今？要响应这些疑问，我们有必要审视与此相关的不同选家的活动和选本的面貌。尤其自明初高棅《唐诗品汇》以来的诸种选本，是否已规划出形塑“古人精神”的轨迹，就很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有明一代，唐诗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而高棅编选的唐诗选本，对崇唐风气以至明代的唐诗学，起了极大的作用，《明史·高棅传》说：

其所选《唐诗品汇》、《唐诗正声》，终明之世，馆阁宗之。

《四库全书总目·唐诗品汇提要》进一步说：

《明史·文苑传》谓：终明之世，馆阁以此书为宗。厥后李梦阳、何景明等摹拟盛唐，名为崛起，其胚胎实兆于此。

一般论著都根据这个讲法，认为明初以至李梦阳、何景明的复古主张，都由高棅所引发。我在二十多年前，对《明史》以及《四库提要》这个讲法，提出了质疑。近年来学界对此颇有反响，无论赞成或反对之说，多有更深刻细致的讨论。虽然我当年读书的疑问——为什么李梦阳与何景明的著作中绝口不提高棅及其诗选？——至今还未能因而释除，但这些讨论的确促进了我们对高棅选本的了解。《明史》以至《提要》之说，提示我们注意高棅二选重大和深远的影响；我们正好以此为线索，对明代众多的唐诗选本作出深入的研究，揭示其间传承及变奏之迹。陈颖聪《从复古到性灵——高棅的诗歌理论及其影响与流变》，就是这个方向的一次深具意义的探索。

本书除了细意整理高棅的生平、交游、创作与诗论的关系，以至《品汇》、《正声》等的版刻流传等等之外，更因应高选在“声律纯完”、“性情之正”、“辨体意识”、“源流正变”，以至

“李杜优劣”的表现，析论有明显沿袭及变化之迹的后继选本，如康麟《雅音会编》、李攀龙《古今诗删》的“唐选部分”、钟惺与谭元春的《唐诗归》、唐汝询《唐诗解》、周敬与周珽的《唐诗选脉会通评林》等，以具体实证的方式，说明高棅诗选的影响；同时也深入探析明代以唐诗为中心的批评观念，如何“从复古走向性灵”、“从滥觞走向成熟”。从选材以至切入问题的方式，颖聪此著作在在有其特色，对于明代文学思潮的研究，作出相当的贡献。

颖聪在广州中山大学本科和硕士毕业后，来香港从游；其间我又从香港科技大学移席香港教育学院，主持院务及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颖聪在博士课程修满以后，到研究中心协理唐诗选的研究项目，并襄助中心各种研讨会、工作坊，以至读书会等活动。杂务虽多，她却不为之囚锁，而是藏修息游，学业精进，年间完成了这一部专著，这是非常值得欣慰的。期望颖聪不自满足于此，在往后的学问之途，更大步迈进。

陈国球

2012年5月22日于八仙岭下

## 序二

颖聪的博士学位论文终于要出版了，为她高兴。从2001年入读中山大学中文系本科，继而免试攻读硕士学位，再到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师从陈国球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一步一个脚印。近十年来，她从本科至硕士阶段研读先秦文学，到博士阶段研究明代文学与文学批评，看似跳跃很大，其实颇有内在逻辑。业师黄海章、邱世友先生曾不止一次说起过研习先秦文史典籍的重要，并时以章太炎、黄侃先生为例，指出通训始能通文字，通文字始能通辞章，通先秦然后历代可迎刃而解，其对小学和先秦典籍的重视对我们古典文学研究者很有启发意义。事实上，颖聪同学通过对《荀子》、《诗经》的习读和初步的研究，在文字基础和逻辑思维的训练方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她以后从事明代文学研究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毫无疑问，这部名为《高棅的诗学理论及其影响与流变》的博士论文，属于陈国球先生专精的领域，其对颖聪博士论文选题及研究的影响不言而喻。正因为陈先生的精心指导，该著能够后出转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意拓展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并在若干论题的研究上有新的突破。

明代是一个全面宗唐的时代，明人选唐诗盛况空前，数量大大超过宋金元三代。其在宗唐的同时，对唐诗的研究也达到了很

高的水准。我一向认为，明人虽然在诗歌创作方面平淡无奇，但在唐诗研究方面却能超越前代，垂范后世。如对唐诗史的整理、分期、定位，对唐代作家的分析评判，对唐诗的编辑评选，对唐诗声调格律的揣摩品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结论性意见，至今仍为学界所采用。这就是明人的贡献，无论其在诗歌创作方面是如何地拙劣，在诗学研究方面却是功勋卓著。

在明代众多有关唐诗研究的著作中，高棅的《唐诗品汇》和《唐诗正声》无疑非常受人关注，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在已有的研究领域中如何突破创新，是一个难度很高的事情。我欣喜地发现，颖聪的这部著作，颇有一些值得称道的地方。

首先是在研究范围及研究对象方面，能避熟就新，有意挑选几个以往被人关注较少的选本与《唐诗品汇》进行比较性研究。如《雅音会编》、《古今诗删》（唐诗选部分）、《唐诗解》、《唐诗归》、《唐诗选脉会通评林》等，其中除了《古今诗删》曾得到较多关注外，其他数本皆论者寥寥。而且，除了《唐诗解》在2001年出版了由王振汉等点校的整理本，其他则分见于《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之中，未有今人整理的点校本。这些新材料的使用和新领域的开拓，使得高棅研究不限于高棅自身，而是在一个更漫长的时间维度里去考察高棅的诗学思想及其影响，从而使高棅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能发现一些过往未被人发现的现象和结论。这些，可以看作是著者在研究范围及研究对象方面的创新性开拓。

由于作者的研究领域扩大，视野开阔，所以在研究成果方面时有新见。

其一，作者认为，高棅重视“声律”的主张，最早在《雅音会编》中得到响应。到了钟惺、谭元春的《唐诗归》，则以抒发“性情”为标准，发展了高棅关于“得性情之正”的一面。

晚明周珽进一步总结诗歌发展的经验，在《唐诗选脉会通评林》中，吸收了高棅关于诗歌“声律”与“性情”的两个本质要素，并由此影响了明末乃至清初“性灵”诗说的诞生。“我们在这个对比研究中，梳理出明代诗学发展变化的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明代诗歌从复古诗派向性灵派过渡和发展的过程中，高棅及其选本是起到了实实在在的媒介和催化的作用。”这一看法，以往未被人指出过。

其二，作者着重讨论了李攀龙的古诗观。在辨析学术界有关李攀龙古诗观中的一些传统说法的同时，认为高棅继承了严羽、杨士弘的思想，肯定唐代古诗是汉魏古诗的发展，二者同属一个系统，同属一个体裁。这一看法，后来也为《唐诗归》、《唐诗选脉会通评林》所接受。在明清两代，李攀龙的“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是一个影响深远的论断，其大意是指唐人古诗远离了汉魏古诗的传统，其所作古诗只是唐人的古诗。对这一看法，自然是拥戴者、批评者兼有。现今的学者对此虽有涉猎，但仍未足够。作者通过研究，认为高棅的辨体意识，不但影响着李攀龙，更是上承严羽、杨士弘，下接钟惺、谭元春、周珽，形成一个颇具影响的认知体系。这在有关唐人五言古诗及五言古诗理论的研究方面，是一个新的贡献。

其三，在“李杜优劣论”方面，也有新的研判。作者提出，高棅面对明初诗坛的状况，一方面要消除江西诗派的影响，因而在理论上必须抵制江西诗派为了复古而提倡的尊杜倾向；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扬盛唐气象，因此在选诗的具体操作中，又充分肯定了杜甫的地位。对杜甫的偏好，同样表现在后来的《雅音会编》、《古今诗删》、《唐诗归》中，直至《唐诗解》、《唐诗选脉会通评林》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由高棅发端的、在明代“扬杜”的取向，一直延续到明代的中晚期才有所改变，严

沧浪关于李白、杜甫不可优劣论的观点才得以真正落实。从这一研判可以看出，作者有意识地想从“李杜优劣论”的争议当中，去考察明人唐诗趣味的变化和诗学思想的变迁。

此外，这部著作在有关版本刊刻的考证，重要诗学范畴的辨析方面也用力甚勤，取得了相当有价值的结论。比如对《唐诗品汇》的刊刻年代，不少人主张刻于成化末年，作者则根据钮氏、罗氏《书目》，及有关的序文，将刊刻年代定在建文末年。此说持论有据，颇为可信，对于我们判断《唐诗品汇》的影响有重要意义。又该著对格律、骨格、气格、格力、格调等所作的辨析，也详尽周到，可资借鉴。

稍嫌遗憾者，在于这部著作对高棅的另一选本《唐诗正声》关注不够。但无论如何，这是一部新见迭出、论证扎实、结论可靠的学术著作。其面世后，当会对明代文学批评及唐诗研究起到促进的作用。

春去秋来，光阴荏苒。十年以后，能为颖聪的这部著作撰写序言，是一件令人欣慰和愉快的事情！

孙立

2012年4月18日于康乐园

#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	1
第二章 高棅及明初诗学状况 .....	18
第一节 高棅简介 .....	18
第二节 闽中诗派 .....	37
第三节 明初的盛唐气象 .....	49
第四节 唐宋以来唐诗的流传 .....	61
第五节 理论背景 .....	71
第三章 关于本书涉及的几个选本 .....	79
第一节 康麟《雅音会编》 .....	79
第二节 李攀龙《古今诗删》中的“选唐诗” .....	86
第三节 钟惺、谭元春的《唐诗归》 .....	91
第四节 唐汝询的《唐诗解》 .....	96
第五节 周敬、周珽的《唐诗选脉会通评林》 .....	104
第六节 小结 .....	117



第四章 “声律纯完”与“性情之正”——诗歌的根本要素	120
第一节 高棅的“声律”说	120
第二节 康麟对传播唐音的贡献	147
第三节 《唐诗归》的“性情”说	160
第四节 周珽对高棅“声律”说的肯定和发展	180
第五节 周珽的“诗脉”说	191
第六节 小结	206
第五章 “辨体意识”的承传	209
第一节 高棅的“辨体”意识	209
第二节 《唐诗归》从“声律”的标准走向“情调” 与“风格”	231
第三节 唐汝询对体裁认识的调整	244
第四节 周珽重视“声律”，却又不惟“声律” 是依的辨体意识	250
第五节 小结	261
第六章 古诗辨	264
第一节 高棅的继承和发展观	264
第二节 对李攀龙“唐无五言古诗”的思考	275
第三节 《唐诗归》坚持高棅继承与发展的观点	299
第四节 周珽对复古诗论的修正	307
第五节 小结	318

第七章 诗的“正”与“变” .....	322
第一节 高棅的“正变”观 .....	322
第二节 《雅音会编》坚持以盛唐为“正音”的选诗 方向 .....	350
第三节 《唐诗选脉会通评林》的“四唐”说及“正 变”观 .....	356
第四节 小结 .....	371
第八章 对李白与杜甫的评价 .....	373
第一节 李、杜优劣论的缘起 .....	373
第二节 高棅对“扬李”与“扬杜”的取舍 .....	378
第三节 康麟对李、杜的抑扬 .....	394
第四节 李攀龙的扬杜抑李 .....	398
第五节 从扬杜抑李到李、杜不分优劣 .....	404
第六节 小结 .....	415
第九章 结论 .....	417
参考文献 .....	421
后记 .....	438

# 第一章

## 绪 论

唐诗学在一千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了整理、选编、注释、考证、评点、说解、纪事、拟作等多种研究模式。其中以诗歌选编，即人们所说的“选本”最为瞩目，是唐人别集之外唐诗传播的一个最主要的形式。它除了颇具史料价值外，更是鉴赏与批评的统一，对了解诗歌作品的传播，尤其是诗歌流派的取向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唐诗选本是随着唐诗的传播和繁荣而出现的，对唐诗选本的流传情况，陈尚君先生作了长期的研究，经他考及的唐诗选本有137种，另存目50余种；<sup>①</sup>而孙琴安先生根据史籍统计，历代唐诗选本共有663部，其中唐代20部，五代21部，宋金31部，元代10部，明代216部，清代365部。可惜明之前的选本大多在明代已不可见。流传至今的唐人选本，有清代王士禛所辑的《十种唐诗选》，它是取殷璠《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芮挺章《国秀集》、元结《篋中集》、佚名《搜玉集》、令狐楚《御览诗集》、姚合《极玄集》、韦庄《又玄集》、韦毅《才调集》等九种唐人所选的唐诗集，加上宋代姚铉《唐文粹》

---

<sup>①</sup> 陈尚君：《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见蒋寅、张伯伟主编：《中国诗学》第2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此文后收入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页184—222。

中的古诗而集成。<sup>①</sup>今人傅璇琮在此基础上重新编著《唐人选唐诗新编》，辑录了《翰林学士集》、《珠英集》、《丹阳集》、《河岳英灵集》、《国秀集》、《篋中集》、《玉台后集》、《御览诗》、《中兴间气集》、《极玄集》、《又玄集》、《才调集》、《搜玉小集》等十三种。这些流传至今的唐人选本，虽然在选诗的数量和范围上，都极受局限，但却为保存唐人诗歌，反映唐代诗歌的创作和鉴赏取向，留下了可贵的材料，为后来的唐诗选辑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唐人选辑唐诗的风气延续至宋代，但流传至今的亦为数不多。据笔者所见，有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洪迈《万首唐人绝句》、计有功《唐诗纪事》、周弼《三体唐诗》、赵师秀《众妙集》与《二妙集》等等。

进入元代，诗歌的创作和选评均进入低潮，只有宋末元初方回的《瀛奎律髓》、金代元好问《唐诗鼓吹》以及元末杨士弘的《唐音》最为突出。

诗歌创作经历了宋、元以后，人们开始对诗歌创作的特点和方向作出了认真的反思，例如严羽的《沧浪诗话》就十分深刻地总结了唐、宋诗的创作经验，提出了学习盛唐诗风的创作方向。至明代，士人们基本上是沿着这个方向，探索唐诗的特点，开拓明诗的创作。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重视对唐诗的选读，各类唐诗的选本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根据金生奎先生的统计，终明一代，唐诗选本多至323种。<sup>②</sup>很明显，明代的唐诗选本已经成为了研究明代诗歌理论不可或缺的材料。

那么，时至今日，人们对于唐诗选本的研究，所持的是一种

---

① 中华书局于1953年出版《唐人选唐诗：十种》，所收十种唐诗，不收姚铉从《唐文粹》中辑录的集子，而代之以《唐写本唐人选唐诗》，辑录者乃佚名。

② 金生奎：《明代唐诗选本研究》，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7。

怎样的态度呢？

查清华在《明代唐诗接受史》中指出：

每一唐诗选本或选集，都贯串着选家的美学趣味和诗学观念，包括有关唐诗的观念——即对唐诗的质性、功能、体式、流变、宗主等问题的认识与态度，从而构成其选诗的价值取向。这些，既体现于选诗的相对范围、数量比例以及风格面貌等客观展示之中，也表露在选本的序跋、凡例、圈点批注及其他相关主观论说里。而所有这一切，又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折射出有明一代哲学思潮和人文精神的消长与更迭，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明代文学与文化思想的嬗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sup>①</sup>

近人王瑶在《中国文学批评与总集》中指出：<sup>②</sup>

中国总集的成立和文学批评的出现是在同一时代里，而且有时简直就是一个人担任着上面的两种任务，例如晋代的挚虞；因此总集的选辑不只也是一种批评，而且简直就是他的批评理论的实践。

如果说批评可以对于作家发生指导和帮助的话，总集就是一种具体的标本示范。<sup>③</sup>

① 查清华：《明代唐诗接受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页280。

② 王瑶先生所指的“总集”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中集部之“总集”概念，其中包括全集式总集及选集式总集。此引文所指则是选集。

③ 王瑶：《关于中国古典文学问题》，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页46。

但笔者披阅唐诗研究的历史，发现以往相当一段时期的唐诗研究，除了研读作品本身外，研究者主要习惯于从后人的诗话或文集去发现问题，很少有从唐诗选本的本身去研究唐诗的接受状况。自“五四”以后，随着西方文学批评的影响，及近代文学史学科的建立，选本才开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批评大纲》、方孝岳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都曾涉及一些在文学批评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选本。郑振铎、施蛰存两位先生亦作过几十种选本的提要<sup>①</sup>，鲁迅先生更有专文论述选本的作用。<sup>②</sup>

尽管先哲早已认识到选本的重要性，并对选本的研究发出了呼唤，但人们对选本的认识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的学者才开始对选本的研究有所真正的重视。如杨松年于1981年在《中外文学》上发表《诗选之诗论价值——文学评论研究之另一个方向》<sup>③</sup>，杨先生强调了该文的“目的在提出诗选作品的诗论价值，提出一些分析诗选的方法，以求研究者能扩大研究的范围”<sup>④</sup>，“分析前人的诗论，只取他们的诗话作品，而忽视诗选的作品，往往会导致错误的结论”<sup>⑤</sup>。2002年，张伯伟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一书，专门设立了“选本论”一章，讨论选本的形成、发展和影响。他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诸种形式中，选本

---

① 郑振铎：《西谛书话》，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

施蛰存：《历代唐诗选本叙录》，见《唐诗百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② 鲁迅：《集外集·选本》，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七卷，页136。

③ 杨松年：《中国古典文学批评论集》，香港：三联书店，1987年，页74—108。原载台湾大学《中外文学》第十卷第五期，1981年。

④ 同上，页75。

⑤ 同上，页99。